清宫四时——宫廷生活与文化

古人认为天子受命於天，因此历代君主皆重视颁行历法、树立正统，以顺天应时，根据四时节气从事各项活动。

展览中，我们将探索清代（1644–1911年）皇帝一年忙碌的行程，透过四时流转，呈现清代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生活及文化等各种面向。展览首先介绍清代的历法，为宫廷的各种活动提供时间参照。以春季为始，透过耕织祭祀反映清代宫廷对农桑的重视；炎炎夏日，场景从京城转换到承德避暑山庄，皇帝与边疆各族王公在此汇聚，展现清宫文化的多元；金秋时节，以木兰秋獮为引，探讨清廷的崇武本色；最後以冬日贺岁祈福为中心，传达皇室对新年的美好愿望。

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。
OLI建筑设计事务所为展览提供设计及艺术指导。

顺天应时

从安排农时到订定节庆，皆仰赖正确的历法。因此观象授时与制历颁朔成为君权的体现。

明代（1368–1644年）末年，朝廷为完善历法，特设立历局进行修历工作。然而，过程中旧法和西洋新法一直存在论争。清代康熙帝（1662–1722年在位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皇帝，《清史稿》称其能“亲厘象数，究极精微，前后制新仪七，测日月星辰，则穷极分秒”。他终结了明末以来的历法之争，复行依西洋新法制定的《时宪历》，成为今日世界各地华人所使用的农历之基础。每年十月初一日，清宫都会在午门举行隆重的典礼，颁发次年的历书作为社会生活安排的依据。

春——耕织

自古以来，农耕与蚕织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柱。历代朝廷在春季多有劝课农桑的活动，“天子亲耕南郊，皇后亲蚕北郊”，成为重要的国家祭祀典礼。清代帝后深知农桑的发展关乎经济兴衰。雍正帝（1723–1735年在位）曾多次前往先农坛祭祀，扶犁耕地，以示劝农。孝贤皇后（1712–1748年）也曾于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三月于先蚕坛祭祀，祈求蚕桑丰收。宫廷并会于二月花朝节祭拜花神，劝农桑同时求丰年。

描绘男耕女织的图样至宋代（960–1279年）已形成体系，透过系列图画并配上诗文，详细记录生产场景和过程，以推广耕织技术。除画作外，清宫也制作带有耕织相关图样的各种器物。乾隆帝（1736–1795年在位）更在清漪园（今颐和园）创建耕织图景区，在皇家园林中呈现“耕”与“织”的场景。

夏——避暑

北京夏季炎热，自清康熙年（1662–1722年）起，每年约农历五月至九月间，皇帝多驻跸热河行宫，又称避暑山庄。康熙帝形容：“热河地既高敞，气亦清朗，无蒙雾霾氛”，又盛赞此地“四围秀岭，十里澄湖，致有爽气”，实为消夏胜地。

避暑山庄亦是紫禁城外另一政治中心。清代皇帝在此批阅奏章、召见大臣、处理军政，以及会见边疆各族首领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皇帝于避暑山庄大宴蒙古贵族，庆祝平定准噶尔部；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西藏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（1738–1780年）前来避暑山庄庆贺皇帝七十大寿；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，安南来朝，上表纳贡，于热河觐见皇帝；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，皇帝也是在此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（1737–1806年）。清代皇帝在夏季于避暑山庄的活动，推动了满、汉、蒙、回、藏等民族之间的交流。

秋——狩猎

金秋时节，清宫经常于承德避暑山庄以北约150公里的木兰围场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，以满洲八旗为营卫、内外蒙古扎萨克扈从，称为“木兰秋狝”。自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起至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的135年间，清帝到木兰围场行围近百次，每次持续约一个月。

木兰秋狝是清代兼具军事训练与政治礼制功能的国家大典。行围肄武是满洲旧习，乾隆帝（1736–1795年在位）认为“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，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，骑射渐致生疏矣”。大猎时，有上千人参与撒围、待围、合围、罢围，不仅要求骑射技术，也考验王公大臣与八旗兵勇的合作能力，同时可对蒙古诸藩加恩怀柔。乾隆帝把木兰围场行围纳入礼制，在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举行了第一次秋狝大典，在位其间共举行了40余次秋狝。

冬——贺岁

春节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，始于腊月初一，终于二月初二。清代宫廷用一连串的活动辞旧迎新：以带有吉祥寓意的物品装饰宫殿，祭祀祖先以示慎终追远，宴请宗亲大臣联络感情，既热闹也庄重。

按清宫习俗，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安灯，次年二月初三收灯，称为“灯节”。紫禁城内乾清宫与皇极殿区域张挂的彩灯，可多达上百盏。宫灯一般顶部有宝盖，四周与底部有流苏，装饰华美。雍正朝（1723–1735年）开始在圆明园举行大型灯会，燃放烟花，观赏灯戏，并举行筵宴。许多器物与服装上也饰以宫灯图样，以“灯”之谐音寓意“五谷丰登”，标志着从春日劝课农桑到腊月丰登仓廪的循环。